

跨越文化的界限:如何理解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思维?*

约恩·吕森(Jörn Rüsen)

【提要】 西方的历史思维范式,不应当再被当成不同文化间交流与比较的标准及决定因素。西方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共同分享着历史意义的逻辑普遍性,它们的区别是一种普遍主义表现的差异。历史思维逻辑的不同文化表现方式不应当相互排斥,而是要互相解释。

时下有关历史思维的不同文化间的话语,深深地受到了一些根本性差异的束缚,其中主要部分是“东方”与“西方”的区别。这种认识论的前提通常没有得到表达,更谈不上加以批评。在不同文化的话语背景下,本文沿着黄俊杰教授的尝试方向,对中国历史思维提出新的看法。文章赞同黄教授的做法,对中国历史思维特性的描述聚焦于历史意义生成的基本标准上。黄教授认为,历史中意义生成的中国式方法与西方式方法有严格的差异。与之相反,我认为两种历史思维的传统都遵循同一种逻辑,亦即案例模式逻辑,西塞罗的名言“历史乃生活之师”在西方传统中是众所周知的。与其如黄教授那样将之视为中国历史思维的典型模式,不如寻找一种共同逻辑的改进模式,来澄清中国与西方的不同所在。问题是,历史思维从案例式到遗传式的范式转换,对黄教授提出的中国传统意味着什么?既然它是一种通过对人类世界时间化的解释寻找历史中现代性的模式,这种范式转换就不应当仅仅被看成西方的东西。

一、全球化进程加剧了不同文化的交流。每一个民族与文化不得不提出自己区别于他者的文化特征。在此交流中,历史是表述与他者身份不同的自我文化身份的媒介,这是自我与他者对话中的独特声音。黄教授在文章中正是这样做的。他认为中国文化有一种重要的历史性,并通过引用古典文献对之进行描述。^① 他的文章揭示了中国传统中历史思维的基本逻辑,据称即使在今天依然有效。

初看上去,这似乎只是经验性的描述,但其实远不止于此:它是中国区别于他者的文化

* 本文的早期版本,题目是“评黄俊杰教授的‘中国历史思维的沉默特性’”,首次发表在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 8 (2005), 267-272, 感谢允许发表修订版。

① 他的解释遵循东亚学者的基本思想脉络,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作出区分。参见 Masayuki Sato, “Cognitive Historiography and Normative Historiography”, in *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 An Intercultural Debate*, ed. J. Rüsen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2), 128-141; Thomas H. C. Lee, “Must History Follow Rational Patterns of Interpretation? Critical Questions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in *ibid.*, 173-177.

独特性的声明。黄教授文中的范式性“他者”通常都不是特指的,但在最后一部分已经很清楚,“他者”显然意味着西方。

黄教授的观点,明显是反对历史思维领域中西方的支配地位。它反对现代化进程中的这种趋势,位于其中的世界各地的文化都已经被历史思维的现代方式的力量所俘获——至少形式上如此,历史被视为一门学科,或一种发端于西方启蒙运动思想与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的“科学”。这已经成了处理历史的主要方式,起码在学术话语层面上是这样的。黄教授的文章颠覆了西方的统治:我们必须了解,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能比中国更具有历史性。一位西方学者该如何对这种刺激做出回应?

一、西方学者们必须要获知中国文化的基本历史性。历史性的文化不是西方的特权,因而西方的历史思维范式,不应当再被当成不同文化间交流与比较的标准与决定因素。^①但难道只是简单地用一种支配性的中国范式来代替支配性的西方范式就可以了吗?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文化,各自都拥有处理历史的独特方式(如伊斯兰式)。撇开此简单事实不论,中国与西方历史思维的对抗将导致这样一种逻辑困境:两种处理历史的模式都声称是普世的。我们该如何对待历史思维中不同的普遍主义?西方与中国学者都应当同意,双方的立场都不可能是正确的。此外,他们应当在自己的传统中与在他们对历史思维的自我理解中处理不同的普遍主义。

二、为了解决这种困境,我们应沿着黄教授的讨论,并参考历史思维的基本逻辑原则。他将中国历史思维的逻辑原则表述为具体的、类比隐喻的、对经验证据与规范性目的的综合。一方面是具体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是人类生活的普遍规律,二者之间特定的相互关系带来了综合。历史思维在对历史事实的观察中生产出基本规则。通过此方式,保证了人们能将这些基本规则运用到当前的困难中。这确实是历史意义生成的案例式逻辑。

我的主要看法是,这种逻辑并非只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排他式的有效性,包括西方在内的许多其他文化中同样都可以看到这种逻辑。在西方,案例式逻辑统治了从古代到18世纪下半叶近代历史思维兴起之前的历史思维。西塞罗将此逻辑表述为“历史乃生活之师”^②,许多西方历史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范例,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及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就是两个典型。事实上,黄教授视为中国历史思维特征的每一面,都不难从西方历史中找出案例与解释。^③例如,他说在中国,“作为学术主题的政治基本上就是历史”^④。西方政治的一个最主要范式理论也可以说明同样的情况:马基雅维利在文集第一卷中,就是通过解释李维的古代史著作,阐发了他对政治的看法。^⑤李维给马基

① See Rusen, ed., *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

② Cicero, *De Oratore* 2, 26.

③ 参见代表近代西方早期人文主义历史理论的论文集, Eckhard Kessler, *Theoretiker Humanistischer Geschichtsschreibung* (Munich: W. Fink, 1971).

④ Chun-Chieh Huang, “The Defining Character of Chinese Historical Thinking.” *History and Theory* 46 (2007), 184 (this issue).

⑤ Niccolò Machiavelli, *Discorsi sopra la prima deca di Tho Livio* [1531]. See Felix Gilbert,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Politics and History in 16th Century Flo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雅维利提供了用以发现政治本质的历史案例。案例式逻辑在其他文化中同样也可以很容易找到,如伊斯兰世界最著名的历史学者伊本·赫勒敦,意味深长地将他的伟大著作命名为《殷鉴书》(*The Book of Examples*)^①

黄教授很清楚西方同样存在案例式的历史思维。但他说,与中国相比,西方历史案例只是为了说明理论知识,即存在一种抽象的普遍规则凌驾于历史事实的经验性证据之上。不过在西方历史思维中,事实并非如此。“历史”这个词汇在西方数个世纪中仅仅意味着“经验性的证据”^②。作为一个巨大的经验蓄水池,历史使得人们能表达基本规则,用以掌握当前生活的问题,并发展出一种对未来的可靠视角。基本规则与理论知识相对于单个事实与事件的逻辑优先性,在西方是自然科学的问题,而不是历史学的问题。

三、假如这一点是真实的,即黄教授令人信服地描述的历史意义生成的案例模式,无论对于西方历史思维的还是对于中国历史思维都同样有效,那么我们应当用新的模式提出问题,中国历史思维的特性到底是什么,以及其与西方的区别在哪里。这不是用案例模式反对另一个模式的问题,关键是这种模式的说明。这种提问方式摒弃了两种普遍主义的很成问题的对抗性。西方与中国在他们的历史文化中,共同分享着历史意义生成的案例模式的逻辑普遍性。他们的区别是一种共同普遍主义表现的区别,一种对于人类、自然、宗教等概念的理解中发展与体现的不同境况所造成的区别。

四、在评论的最后,我仍然要提出一些有关中国以及西方历史思维传统的问题。我想提出一种新的处理历史的模式,或许有助于以建设性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历史思维逻辑的不同文化表现应当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框架构建,它们不应当互相排斥,而是要互相解释。如此一来,差异性可在互相认知规则下得到处理。认知的基础是对能包容文化差异的历史思维中普遍主义与普遍化逻辑的共识。在普遍主义中,差异不会消失,而是与之相反,它的特征变清晰了。以一种散漫的、包容性的方式共享这种互相影响的不同普遍主义的另一种普遍主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们才能和平地、互相尊重地交流他们的特定历史身份——超越什么文化才拥有“真正的”历史性这个问题所带来的“文明的冲突”^③。

关于中国的与西方的历史思维模式,我们应当提出什么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它们内部是否包含不同于意义生成的案例逻辑的有效逻辑成分。我想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在所有文化中都发现不止一种制造历史意义的逻辑。文化特性可以用多数文化共有的(如历史思维的案例模式)不同逻辑因素的不同杰出人物来加以解释。^④ 这些模式可在

① Ibn Khaldun, *The Muqaddimah: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Vol. I, transl. F. Rosentha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② Arno Seiffert. *Cognitio Historica: Die Geschichte als Namengeberin der fruhneureitlichen Empirie* (Berlin: Duncker und Humblot, 1976).

③ See Jorn Rusen. "Culture: Universalism, Relativism, or What Else?" *Journal of the Interdisciplinary Crossroads* 1:1 (April, 2004). 1-8

④ Jorn Rusen, "Some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Intercultural Comparison of Historiography," *History and Theo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me Issue 35(1996). 5-22 (Chinese translation: "Kua wenhua bijiaoshixue de yixie lilun zouxiang," in *Zhongguo shixueshi*) yantaohui, cong bijiao guandian chufa lunwenji, ed. S. Weigelin-Schwiedrzik and A. Schneider [Bangiao/Taipei: taoxiang chubanshe, 1999]/151-176)

基本历史理论层面加以分类区别。^①

第二个问题与现代性有关。随着现代历史思维的开始,西方案例思维对历史的漫长统治走到了尽头。处理历史的案例模式已经被遗传模式取代。在遗传模式中,关键问题不是调整具体经验事实与普遍规则之间的判断逻辑,而是普遍规则本身的内在时间性逻辑。^②这种新的逻辑解释了人类生活的基本组织中加速变化的挑战。现代化进程中人类事务的具体改变与世界范围的多样发展,使得超时空的规则在指导变化的有效性方面出现了问题。

前面提及的历史思维的范式转换,可被表述为普遍原则领域中本质的时间化,即历史源于过去的具体事实。中国传统中是否同样存在人们生活的基本原则层面的时间化的任何潜能,这是个开放的问题。历史中意义生成的案例式逻辑到意义生成的遗传式逻辑的转变,不能被理解为仅仅是从西方输入的东西。在“多重现代性”^③概念中,它被解释为至少部分地是自我文化潜能脉络的变化。^④

时间化起码提供了一个机会,可发展出与普遍化历史路径相关的一种文化差异性的新面貌。通过时间化途径,可用新的方法思考这些普遍主义:它们可被放入一个过程性秩序中,它们的互相影响可被理解为一种指向互相认知差异、因认知而互相改进的运动。历史思维的时间性普遍原则的新领域中,东方与西方可能以散漫的方式相遇。互相排斥的斗争被差异认知文化所取代,不同传统的能力与有效性与认知潜力相联系。

黄教授将处理历史的典型中国方式描述为受非侵略性论点指导。他说,论争不是语义战争的武器,而是获得有效知识的手段。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西方学者们将毫无困难赞同这种处理历史的中国模式。我很高兴黄教授用助产士的隐喻指称典型的中国历史讨论,苏格拉底也用助产士概括他的辩论方式。在使用该隐喻时,黄教授含蓄地表明,我们实际上是一致的。尽管中国与西方有独特的身份,但我们仍然能以对尊重与认知的共同承诺进行交流。

(作者约恩·吕森,德国埃森文化科学研究所教授;译者张文涛)

(责任编辑:姜 芃)

(责任校对:张文涛)

① See Jorn Rusen, "History: Overview,"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ed. N. Smelser and P. Baltes (Amsterdam: Elsevier, 2001), 6857–6864. 我在不同文本中已经阐述过我对于历史的意义生成的类型学理解。最为详尽的一篇是“Die vier Typen des historischen Erzählens,” *Zeit und Sinn: Strategien historischen Denkens*, ed. J. Rusen (Frankfurt: Fischer Taschenbuch, 1990), 153–230; 英文概要见 J. Rusen, “Historical Narration: Foundation, Types, Reason,” *History and Theory, The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ical Events*, Beiheft 26 (1987), 87–97.

② Reinhart Koselleck,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l. Keith Trib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5).

③ Shmuel N. Eisenstadt, “Multiple Modernities,” *Daedalus* 129 (2000), 1–30.

④ Hellwig Schmidt-Glintzer and Achim Mittag, “Aufklärungshistorie in China?,” in *Dimensionen der Historik. Geschichtstheorie,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und Geschichtskultur heute: Jorn Rusen zum 60. Geburtstag*, ed. H. W. Blanke, F. Jaeger, and T. Sandkuhler (Cologne: Bohlau, 1998), 313–330.